

老年人在移动支付场景中的风险感知与应对策略

吴桂园

贵州大学哲学学院, 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14日

摘要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与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 移动支付已成为主流的支付方式, 但老年群体“数字鸿沟”问题凸显, 其风险感知是阻碍数字化融入的关键。本文基于现有研究, 系统分析了老年人在移动支付场景中风险感知的多维表现, 包括账户资金与隐私安全、操作与技术障碍及电信诈骗风险。进一步地, 本文深入剖析了影响风险感知及使用意愿的关键因素, 如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代际技术支持、社会影响与个体特征等, 并指出在技术日趋成熟的背景下, 感知风险对使用意愿的直接影响已不显著, 感知有用性、社会影响等成为更核心的驱动力。最后, 本文从优化产品设计、强化家庭与社区支持、完善社会服务层面的包容性建设及加强安全治理四个层面, 提出综合应对策略, 旨在弥合数字鸿沟, 推动老年群体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

关键词

老年人, 移动支付, 风险感知, 数字鸿沟, 应对策略

Risk Perception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the Elderly in the Mobile Payment Scenario

Guiyuan Wu

School of Philosophy,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May 12,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3,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14, 2026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aging and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mobile payment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payment method, but the problem of "digital divide" among the

elderly is prominent, and their risk perception is the key to hinder digital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multi-dimensional manifestations of risk perception of the elderly in the mobile payment scenario, including account funds and privacy security, operational and technical obstacles and telecom fraud risk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risk perception and willingness to use, such as 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ase of use, intergenerational technical support, social influence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points out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creasingly mature technology, the direct influence of perceived risk on willingness to use is not significant, and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social influence have become more core driving forces.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mprehensive countermeasures from four aspects: optimizing product design, strengthening family and community support, improving inclusiv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services and strengthening security governance, aiming at 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and promoting the elderly to share the fruits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Keywords

The Elderly, Mobile Payment, Risk Perception, Digital Divide, Coping Strateg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并且这一趋势正在加剧。截至 2025 年底，我国总人口为 140,489 万人，其中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32,338 万人，占总人口的 23% [1]。与此同时，中国的移动支付业务发展迅猛，普及率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深刻改变了居民的日常消费方式。这种“媒介化社会”呈现出人口结构越来越“老”，媒体形态越来越“新”的矛盾趋势。移动支付，作为数字化生活的重要入口，却成为横亘在许多老年人面前的一道鸿沟，给他们的衣食住行带来了诸多不便。

尽管移动支付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例如无需携带现金、随时随地完成缴费购物，但老年群体在这一新技术的采纳上却进展缓慢。移动支付在老年人群中的推广面临着交易安全性难以保障、上手操作难度高等现实障碍。许多老年人对移动支付感到不满，其核心在于感知到的风险较大。这种风险感知不仅限制了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也成为了阻碍银发经济潜力释放的关键因素。

因此，深入理解老年人对移动支付的风险感知，探究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本研究将严格基于现有的学术文献与行业报告，首先梳理并界定老年人在移动支付场景中的风险感知内涵与具体表现；其次，系统分析影响这些风险感知及最终使用意愿的多维因素；最后，从产品、家庭、社会及监管层面提出综合性的应对建议，以期为推动老年群体安全、自信地融入移动支付时代提供参考。

2. 老年人在移动支付场景中的风险感知与表现

所谓风险感知，在移动支付领域，通常指用户对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各种不利后果的主观预期和判断。对于老年群体而言，对于风险的感知力相较于年轻人无疑是加大的，这种风险感知并非单一的担忧，而是由多个维度交织而成的复杂心理状态，只有对这种心理状态进行深入的研究，找出问题产生的原因，才能准确地解决老年人在移动支付问题上所面临的困境。

（一）对账户资金与隐私安全的忧虑

这是老年人最集中、最强烈的风险感知。具体地，这种担忧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对账户资金损失的恐惧。许多老年人心存疑虑，担心手机遗失后，账户内的存款会被盗用；或者担心移动支付系统本身存在漏洞，导致个人信息泄露进而造成财产损失。吴利亭、张红梅在其研究中指出，高达 93.33% 的老年参与者最担心的正是账户安全受到攻击或丢失的问题[2]。同时，社会上存在的诈骗问题普遍高发，电信诈骗、无端扣费问题等在老年人无法妥善面对的情况下也正一步步瓦解老年人对科技的信任。所以在推广移动支付服务时，应注意着重解决老年人所面临的这些问题，也即感知风险问题，只有提高他们对移动支付服务的信任和接受度，从而促进移动支付市场的发展[3]。这种对虚拟数字的不信任感，是阻碍他们使用移动支付的根本障碍之一。这种担忧一方面是源于对数字技术发展的陌生，另一方面是缺乏有效风险应对经验。老年人群体往往习惯于现金的“眼见为实”的真实感，而难以理解加密传输、动态验证码等防护机制的实际效用。当子女简单告知某种行为或者某种方式的使用方式“很安全”时，往往无法消解老年人群体的深层焦虑；只有不断地去进行演示，不断的去强化这种“未知领域”的安全感才能逐渐淡化这一忧虑。

其次，是对个人隐私泄露的深切不安。移动支付的使用要求用户绑定银行卡、填写个人信息，这种直接关涉个人信息和隐私的方式使老年人对个人隐私的去向感到紧张。上文指出，几乎所有参与者都最担心个人隐私泄露问题。老年人由于其信息甄别能力相对较弱，对后台交易过程又无法直观了解，这种信息不对称加深了他们的不安全感。他们担心自己的消费习惯、账户信息甚至身份信息会被非法获取和利用。这种担忧是一种客观因素，生活中不乏缺少以各种名义窃取信息的案例，这些都在无形之中加剧了老年人的忧虑。

（二）对操作过程与技术障碍的畏惧

与年轻群体不同，老年人在面对智能手机和各类 App 时，普遍存在一种“技术焦虑”。这种焦虑源于多个方面。其一，是学习与记忆能力的下降。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的学习效率降低，记忆力衰退，复杂的操作流程对他们而言是巨大的挑战。不少移动支付软件出于商业营销目的，界面功能越来越多，活动越来越复杂，这使部分老年人对移动支付操作存在畏惧，害怕记不住步骤或误操作，因而不愿意使用。其二，是身体机能的限制。视力和听力的下降使得老年人难以看清小屏幕上的图标和文字，手指灵活度的降低也使得精确点击成为难题。例如，日常的扫码支付操作中，老年人可能需要反复调整手机角度才能扫上，或者因为键盘太小而按错数字，这一系列过程都充满了挫败感和恐惧感，都在加剧老年人的“技术焦虑”。这种焦虑并非同众多生活的焦虑一般可以随时间被抚平，这种情况更多是科技进步之快所透露出的老年人无法避免的一种“生存忧虑”。

（三）对电信诈骗与社会风险的警惕

老年人由于其社会接触面相对狭窄，对新兴的诈骗手段了解不足，容易成为犯罪分子的目标。社会上高发的电子诈骗问题，如冒充客服、虚假中奖、无端扣费等，使得老年人对移动支付产生较强的防备心理。他们不仅担心技术本身的风险，更担心来自社会层面的恶意利用。老年人的风险识别能力不足，这是导致他们在面对诈骗时更容易上当受骗的客观原因。这种负面社会新闻的广泛传播，进一步固化了老年人“移动支付” = “高风险”的刻板印象，尤其是“移动支付”关涉的是最根本的经济问题，经济的重要性以及对经济安全的担忧不得不使得老年人放弃这种“便利”而去做了一个于自己而言更加安全的选择。

3. 影响风险感知与使用意愿的多维因素

由上文可知，风险感知是老年人拒绝移动支付的首要心理栅栏。然而，风险感知的形成以及它最终

如何影响实际的使用意愿，并非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众多研究表明，多个维度的因素在其中扮演着调节和缓冲的角色。

(一) 风险感知的代际差异

研究明确指出，性别对老年人移动支付采纳意愿及各影响因素无显著差异[4]。真正的代际差异体现在受教育水平和月收入这两个社会分层变量上，受教育水平显著影响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采纳意愿。小学及以下学历的老年人与其他学历群体存在巨大差异，其在感知有用性、积极老龄化、采纳意愿上的得分显著低于其他群体。这表明，低学历老年群体构成了一个“数字孤岛”，其风险感知(虽不显著影响意愿)可能更深、更固化[4]。从小学到本科，感知有用性和采纳意愿呈线性增长。硕士及以上学历的老年人的采纳意愿最高。这反映了一个分层事实：教育水平是抵御技术恐惧(风险感知)最强力的“疫苗”。高学历者更擅长通过理解技术原理、查询信息来对冲风险，从而选择采纳。

其次是门槛效应：月收入在 1000 元及以下的老年人，其对移动支付的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采纳意愿显著低于其他所有收入群体。这说明，贫困老年人面临的不只是技术门槛，更是“经济门槛”。他们可能缺乏智能手机、数据流量等硬件支持，对“流量费”、“服务费”等隐性成本(研究中感知风险量表包含此维度)更为敏感[4] [5]。月收入在 3001~6000 元与 6001~9000 元的老年人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高收入群体更注重生活品质与便利性，其感知有用性和采纳意愿更高。这表明，收入水平不仅影响能否“买得起”设备，更影响能否“享得起”便捷，从而改变其风险-收益的权衡天平[5]。

代际差异并非简单的“性别”或“年龄”差异，而是“受教育水平”和“月收入”所塑造的“数字素养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差异。低学历、低收入老年人构成了最脆弱的“风险高感知、采纳低意愿”的代际群体。

(二) 风险感知的城乡差异性

城市研究所测得的感知风险(资金损失、信息泄露)是典型的系统化风险，即由技术或平台漏洞引发的风险。由于城市基础设施、金融监管和反诈宣传更到位，这种风险感知的负面影响被有效缓冲。对于农村老年人，风险可能更多是过程性风险，如操作复杂、不小心误触、网络不稳定导致支付失败、售后维权困难、缺乏身边人指导。其风险类型更贴近“感知易用性”的反面，而非单纯的“不信任平台”。因此，在农村，感知风险(操作过程风险)对采纳意愿的负向影响可能显著高于城市[6]

城市家庭中，子女/孙代更密集、更主动地进行数字化反哺，且往往能提供高质量(远程、视频、多次重复)的技术支持。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数字反哺”存在“时空断裂”。老年人可能只能通过电话获得碎片化指导，或依赖同样不精通的配偶/邻里。代际技术支持的可得性、时效性和有效性远低于城市，导致其无法有效补偿农村老人的风险感知。

总的来说，城市是“进取型”积极老龄化，城市老人有更多机会参与社区活动、老年大学、社会组织，其积极老龄化更多表现为进取地学习新事物，移动支付是其中一项。农村则更多是“生存型”积极老龄化，农村老人的“积极”可能更多指向保持劳动能力、维持自给自足。移动支付的用处(如网上购物、外卖、打车)在农村场景中可能并不突出，其感知有用性可能较低。因此，积极老龄化对采纳意愿的正向激励作用在农村可能显著弱化[6]。

现有城市研究结论不能简单推及农村。在农村，由于风险类型差异(过程性风险)、代际技术支持“断裂”、以及积极老龄化适用语境改变，可以假设：感知风险对采纳意愿的负向影响将更为显著；代际技术支持的缓冲作用将减弱；积极老龄化的正向影响将降低。这将导致农村老年人面临一种“高风险、低缓冲、弱激励”的决策困境，其移动支付采纳率可能远低于城市。

(三) 技术接受模型下的核心变量：有用性与易用性

根据戴维斯(Davis)提出的技术接受模型(TAM)，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是决定用户是否接受一项

新技术的两个核心要素。对于老年人而言,这一点同样适用,但作用方式略有不同。

感知有用性是影响老年人移动支付采纳意愿的最关键因素[4]。所谓感知有用性,即老年人是否认为使用移动支付能为其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当他们意识到移动支付可以规避携带现金的不便,可以快速完成交易,可以足不出户完成生活缴费时,这种方便快捷的价值感会极大地激发他们的采纳意愿。即便他们对风险仍有顾虑,但强烈的实用性预期会压过风险的恐惧。如看病买药、生活缴费等方方面面都可以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地使用移动支付,能感知到移动支付有用性的老人会偏向使用移动支付[5]。

相比之下,感知易用性的作用则更为间接。感知易用性,即老年人认为学习和使用移动支付的难易程度。虽然多项研究证实,在回归分析中,感知易用性对采纳意愿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但其影响系数通常小于感知有用性。更重要的是,感知易用性会通过影响感知有用性来间接影响使用意愿。也就是说,如果老年人觉得移动支付操作起来很简单、很易学,他们就会倾向于认为这个技术是“为我设计的”、“我能驾驭的”,从而增强对其有用性的认知。反之,复杂的操作会打击他们的信心,不仅直接降低使用意愿,还会削弱他们对移动支付价值的认可。

(四) 外部环境与社会关系的影响

个体的决策从来不是孤立的,老年人尤其受到其所处的社会和家庭环境的影响。

其中,代际技术支持被公认为是影响老年人技术采纳的重要依托。这是一种数字反哺现象,即年轻世代(子女、孙辈)向年长世代提供技术指导和情感支持。调研结果显示,子代/孙代的鼓励、指导和问题解决,能够显著地正向影响老年人的感知易用性和采纳意愿[5]。子女/孙代提供的技术支持(代际技术支持)显著正向影响采纳意愿。当年轻人向老年人推荐并指导使用移动支付时,老年人将对子女的信任部分转移到了该技术上,从而降低了其风险感知对采纳决策的抑制作用。即“因信任而使用”。这种亲人的直接教学极大地降低了他们的学习难度和心理负担。在对广州老年人的研究中发现,子女和亲邻在老年人学习如何使用移动支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6]。

在对上海和北京两地的调查案例分析中均得出了一个看似悖论的结论:感知风险对老年人移动支付的采纳意愿(或使用意愿)没有显著直接影响[5][7]。这说明,并非老年人不感知风险,而是其风险感知与采纳意愿之间的关系被一系列中介和调节因素所消解。中国作为全球移动支付最发达的国家,技术(如指纹识别、刷脸支付、支付验证)和安全保障制度(如资金托管、交易保险、账户安全险)已高度成熟。老年人普遍认为常用的支付平台(如支付宝、微信支付)“比较正规”,降低了其风险预期。同时,国家对移动支付的强监管和持续的反诈宣传,增强了老年人的防骗意识,但同时也使其对“正规”支付渠道的信任度提升。老年人对“平台”本身的风险感知可能较低,而更警惕“诈骗链接”等外部风险,这导致调查中“感知风险”与“采纳意愿”的直接关联不显著。代际技术支持直接提升了感知易用性,并间接提升了感知有用性。当操作障碍被他人辅助克服后,老年人对操作失误、密码遗忘等风险事件的担忧会显著下降,从而弱化了风险感知对意愿的负面影响。当老年人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移动支付,并从中获益,这种普遍使用的氛围会无形中成为一种推动力,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向老年人证明这项技术是安全的、有用的、有未来的,从而降低了他们对未知风险的恐惧的社会学证明。

(五) 个体特征的调节作用

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心态,这些个人背景因素也在调节着风险感知与使用意愿之间的关系。

年龄与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采纳意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换言之,年龄越大的老年人,越倾向于认为移动支付对自己没用、不好学,因此越不愿意使用。这与高龄老人身体机能下降、对新事物接受能力更差有关[4]。

受教育水平和月收入则起到了显著的放大镜般的作用。受教育水平更高、月收入更高的老年人,其

对移动支付的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更强, 采纳意愿也更高。这是因为这部分人群拥有更强的学习能力、更广的知识面和更高的风险承受能力, 他们更能够理解技术原理, 并评估利弊。

最后, 老年人的心态, 即积极老龄化的程度, 也是一个关键的内部驱动力。积极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对融入社会、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种积极主动的心态正向影响他们对于移动支付的采纳意愿。心态更年轻、愿意拥抱新事物的老人, 自然更愿意去克服困难, 而非放大风险。积极老龄化(即学习心态年轻、愿意尝试新事物)对采纳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拥有积极心态的老年人, 更倾向于将使用移动支付视为一种“跟上时代”的自我实现, 其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和成就感会部分抵消对风险的担忧。这种心态使他们将风险视为“可以承受”或“需要学习克服”的挑战, 而非不可逾越的障碍[3]。

老年人并非不惧风险, 而是其风险感知的负面影响被技术制度的成熟性、代际支持的信任补偿、积极心态的淡化作用以及强烈的感知有用性权衡所共同消解。“方便有用”是主导因素, 而风险感知则退化为一个非决定性的调节变量。

4. 风险感知与使用意愿关系的再审视及应对框架

在梳理了上述多个影响因素后, 一个值得深思的结论浮现出来: 在中国目前的移动支付环境下, 感知风险对老年人使用意愿的直接影响, 在多个实证研究中呈现出并不显著的结果。

在对上海市老年人的调研中发现, 感知风险与采纳意愿虽然存在低度负相关, 但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 其直接影响并不显著[4]。基于北京地区的研究也提出了相似的结论, 认为感知风险不再是主要的阻碍因素[8]。这些研究表明, 虽然老年人集体口头表达了对风险的极高担忧, 但这些担忧并不必然转化为实际拒绝使用移动支付的行为, 只要跨越掉使用的技术门槛和培养出可靠的安全支付意识, 多数老年人仍是愿意使用移动支付的手段去给自己的生活提供更多的便捷。

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 其背后合理的解释是: 在中国的社会与技术背景下, 其他正向因素的驱动力远大于负向风险的阻碍力。中国作为世界上移动支付最发达的国家, 其技术和监管体系已经日趋完善。移动支付监管不断强化, 指纹识别、刷脸支付等智慧支付技术不断升级, 反诈宣传也深入人心。当老年人觉得常用的平台(如微信、支付宝)都比较正规, 且交易记录有迹可循时, 他们对风险的担忧就会大大减轻。同时, 强烈的“感知有用性”(被时代推着走不得不用的便利)和“社会影响”(身边人在用)成为了压倒风险担忧的决定性力量。老年人可能一边担心着隐藏的风险, 一边为了生活便利、为了不被社会抛弃而选择使用。

但是, 这并不能作为忽视风险问题的理由。因为对于尚未采纳甚至抵触移动支付的另一部分老年人, 风险感知依然是他们难以逾越的心理壁垒。因此, 构建应对策略时, 既要肯定技术成熟度带来的正面效果, 更要直面并解决依然存在的风险痛点。一个有效的应对框架, 需要从以下四个层面展开:

第一, 产品与服务层面的适老化改造。

这是降低感知易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的最直接手段。移动支付平台应充分考虑老年群体的特殊性, 进行“情感化设计”和“无障碍改造”。具体而言, 需推出大字版、语音版、简洁版的 App, 减少无关的商业功能模块, 将老年人常用的生活缴费、医保缴费等功能突出化。在交互上, 简化操作流程, 增加明确的导航指引和语音提示, 提供人脸、指纹等多样化的密码设置选择, 以解决老年人记不住密码的问题。同时, 开发“亲情账户”等功能, 实现交易信息的共享与子女确认, 让老年人在“有依靠”的情况下放心使用[9]。

第二, 家庭与社区层面的数字反哺。

子女的耐心指导和社区的技能培训是融化老年人“技术恐惧”的温暖阳光。家庭成员应意识到老年人并非不需要, 而是需要更多的支持。要鼓励、认可老人的学习行为, 耐心解答他们的疑问, 帮助老年

人识别安全高效的平台，让老年人加强对于有安全保障平台的信赖，从一点点的变化中逐渐去认识到和接受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便捷。社区也应发挥作用，可通过招募志愿者、聘请专业老师的形式，开办智能手机和移动支付的教学指导班，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从最基础的识字、屏幕点按开始教起，这是针对一些长期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只有以公共机构的公信力去进行科普和教学，老年人才能在没有子女在身边的同时也愿意接受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改变[10]。

第三，社会服务层面的包容性建设。

在推动移动支付的同时，必须保障老年人的选择权。商家、医疗机构、公共场所应尊重老年人的支付方式选择，保留充足的线下支付结算渠道和现金交易方式。社会应营造一种“科技友好”的氛围，让老年人不会因为不会使用移动支付而感到羞耻或被排斥，支付方式只是选择，而不是标准[11]。

第四，安全治理与宣传层面的强力保障。

这直接关乎对资金安全风险和心理风险的管控。监管部门和平台应不断提升风控水平，利用科技手段监测异常交易，及时向老年人预警。同时，要严厉打击针对老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并通过多种渠道(如社区讲座、电视节目、大字体折页)进行通俗易懂的反诈知识宣传，提高老年人的金融素养和风险识别能力。更要建立高效的维权渠道，一旦发生纠纷，才能让老年人有地方说理，快速解决问题[8]。

5. 结论

老年人在移动支付场景中的风险感知是一个由资金安全、隐私泄露、技术障碍和诈骗恐惧等多重维度构成的复杂心理状态。这种感知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受到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代际技术支持、社会影响以及个体特征等多种因素的动态调节。在中国移动支付技术高度成熟的社会背景下，尽管风险感知普遍存在，但其对采纳意愿的直接抑制作用被强大的“有用性”和“社会影响”所缓冲，这导致了一种“一边担心、一边使用”的现象。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忽视依然有相当数量的老年人因风险感知而处于数字世界的边缘。推动老年群体融入移动支付时代，关键在于构建一个从产品到家庭、从社区到社会的全方位支持系统。在软件设计上通过设计更友好，更适老的产品、解决老年人学习能力较差的问题。在社会科普和数字反哺上提供更有力的代际支持，帮助老年人构建起安全的数字支付意识。在社会的生活场景中营造更包容的社会环境与建设更安全的支付生态，我们才能真正降低老年人的风险感知，提升他们的安全感与获得感，帮助他们跨越“数字鸿沟”，共享数字化发展的福祉。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https://www.gov.cn/lianbo/202602/content_7059980.htm, 2026-05-10.
- [2] 吴利亭, 张红梅. 老年人移动支付界面的情感化设计研究[J]. 设计, 2024, 37(17): 120-123.
- [3] 吴先锋, 樊吉宏. 基于感知风险的移动支付使用行为实证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10(20): 145-148.
- [4] 严三九, 郑彤彤. 老年人移动支付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上海市老年人为例[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2, 44(10): 15-26.
- [5] 罗霞. 移动支付对老年群体消费影响机制及异质性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沙: 湖南工商大学, 2021.
- [6] 唐咏, 雷平瑞, 孙开放, 代蕾, 李钰霞, 兰孟霞. 跨越数字鸿沟: 老年人移动支付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 老龄科学研究, 2021, 9(10): 36-46+78.
- [7] 张建钦. 老年人移动支付使用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 商业文化, 2021(25): 136-137.
- [8] 张金凤, 刘萍萍, 赵伯尧, 韩布新. 老年人移动支付接受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研究[J]. 人类工效学, 2022, 28(3): 56-61+67.

-
- [9] 邓涛. 大力提升移动支付适老化程度[J]. 中国金融, 2022(4): 100.
- [10] 尹元元, 罗霞. 移动支付对老年群体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J]. 商学研究, 2023, 30(5): 51-68.
- [11] 董方冉. 提升支付服务水平让支付更“适老” [J]. 中国金融家, 2024(6): 46-47.